

台灣的認同 / 差異： 影視媒體的局勢中介與雜存認同的形成*

羅世宏**

《摘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一種強調「局勢中介」(conjunctural mediation)過程的傳播觀點，希望更適當地處理傳播與國族認同的關係。藉由多重資料與方法分析結果的呈現，本文論證國族認同形構是一個局勢中介的過程，而傳播媒介則是此局勢中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換句話說，本文主張傳播媒介之於國族認同的形成，有其長期、累積的「效果」，但拒絕接受傳統效果觀點指導的簡化論點，以其無法掌握傳播媒介與國族認同關係的複雜性。本文論證存在著一種穿透省籍、族群界線，中介於媒介文本與閱聽人接收過程的感知結構，並解釋具有某種「混而不亂」、「雜存」特質的台灣主體認同，如何在台灣戰後（特別是一九七〇年代以降）的歷史局勢變化與共同媒介經驗中形成。

關鍵詞：國族認同、道德經濟、感知結構、微型承認政治、實踐的和解、影視傳播媒體

*《中華傳播學刊》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供非常有份量的建設性批評意見，使作者在本文修改過程得到極大的助益。另外，作者也要特別感謝張茂桂、洪永泰、吳乃德、江宜樺與蕭阿勤等學者，感謝他們在本文撰寫期間與作者就台灣的國族認同問題所進行的多次意見交換。

** 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telshl@ccu.edu.tw

[全然]用他人的想法來思考，以他者的感覺來感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傳播之為用，即在於此。(Peters, 1996: 376)

我們擁有的個體差異性，不會對 [彼此之間的] 傳播造成障礙，而是 [彼此之間的] 傳播的產物。(Peters, 1996: 376)

壹、前言

意義分享與創造人我之間共同性，向來被視為是傳播的根本意涵；對此，傳播思想史家 John Durham Peters 採取了既繼承又批判的立場。他在 1994 年為文剖陳：傳播之為用，或人與人之間進行傳播的需要，乃出於人我之間存在著永不可能消弭的差異、距離 (communication is made of gaps) (Peters, 1994)。此文既出，引發一場論戰，批評者如 Logue & Miller (1996) 強調，傳播的作用在於填補人我之間的差異與距離，設若此種彌合差異與距離的作用發揮得不盡如人意，是因為傳播媒體本身（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缺乏互動性使然。Peters (1996) 隨即為文答辯，笑稱他那盛滿半瓶水的瓶子，被批評者看成了半瓶空。要言之，傳播固能分享意義、創造共同性，但傳播並不能改變差異繼續存在的事實；(認)同與(差)異之於傳播同樣重要，而且兩者間無必然矛盾的關係，同時是傳播活動暫時的起點與終點。

從理論思辨轉入現實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因認同和差異造成的矛盾或衝突，似乎不同於時髦的「終結主義」(endism) 論述 (Gamble, 2000) 所預示的，從此將隨著所謂意識形態、民族國家、現代性甚至歷史本身的終結而消失。事實上，我們仍將隨時處於一個存在著認同與差異的世界 (living with identity/difference)，也無法迴避思考有關認同與差異的問題 (thinking with identity/difference)。國際傳播

學會 2002 年會選在韓國漢城舉行，以「和解透過傳播」(Reconcili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為年會主題，凸顯的正是在傳播去疆界化、國際政治後冷戰化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等多重力量交錯下，思考如何透過傳播促成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和解的必要性。在其就職演說中，陳水扁關於兩岸人民相互理解對方百年來承受的苦難，拋棄冷戰時期的國共對峙態勢的呼籲，也是回應上述正發生在區域內甚至更大範圍的地緣政治、經濟與歷史局勢的變化。

無論就國族認同形構、傳播媒介生態和民主化過程而言，台灣都有其（相對意義上的）特殊性。以台灣做為個案研究對象，其意義不在於研究發現能否通則化，而如 Calhoun (1999: 17) 所言，它是否能夠指出既有理論的限制，從而豐富理論的視野。本文認為，台灣在傳播媒介、國族認同形構與民主化過程的特殊性，正凸顯了傳播媒介與國族認同關係的一般性理論假設之限制：傳播媒介與國族認同之間有一定的因果關係，本國媒體培養並強化國族認同，全球或境外媒體威脅且弱化了國族認同。相反地，本文認為本國與全球媒體不必然強化或弱化國族認同，主張國族認同的形構過程是一個不斷作用在媒體再現與閱聽人接收之間，肆應局勢變化、充滿中介因素的動態過程。此一觀點並非貶低傳播媒介在國族認同形構過程的角色，相反地，它強調的是傳播媒介與國族認同形成之間存在的是複雜、辯證的動態關係，不能用簡單的因果關係表述。因此，本文試圖論證的是：(1) 做為國族論述空間 (national discursive space) 的一部分，傳播媒介促成了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可能，構成了此一國族認同如何被想像的象徵資源，並且提供了此一認同得以被感知、經驗的情境脈絡。(2) 媒體的結構性影響與閱聽人的主動施為 (audience agency) 這一組主流傳播效果理論裡的對立概念，在國族認同形構過程中不僅並存，甚至可能是互補的。

在理論企圖上，透過分析 267 齣電視連續劇的劇情大綱、兩部本地生產的國族歷史電影，以及兩度深度訪談 19 個家庭的電視觀看和影視文本詮釋經驗，本研究旨在發展一種同時觀照歷史局勢變化與中介過程

的理論觀點——「局勢中介的傳播觀點」(the perspective of conjunctural mediation)，強調社會傳播扮演的形塑、建構、調解和協商認同與差異的角色，以便更適當地解釋傳播與國族認同的關係。

爲了把本文的論點放置在適當的參考脈絡之中，下文首先回溯所謂「新台灣人」或「台灣主體」的政治認同在歷史事實與公共論述的落差，嘗試循著認同政治的感性/情緒面向切入，觀照認同/差異政治的深層心理狀態，接著檢視傳播媒介與國族認同的相關理論文獻，最後對照本研究的經驗資料分析，提出重新理論化傳播與國族認同關係的初步思考。

貳、認同 / 差異的政治

國族認同問題，在 1988 年蔣經國逝世後，逐漸提高了在台灣公共論述空間的能見度。隨著國民黨政權逐漸「本土化」，代表最大政治反對力量的民進黨將台獨主張列入黨綱，「外省第二代」政治菁英也成立傾向統一的新黨，1990 年代密集舉行的各項選舉，更是爲國族認同爭議提供了表演舞台。在此時空背景下，這個複雜的國族主義政治化現象及其認同形構，逐漸成爲學術研究的焦點（例如：張茂桂等，1993；羅世宏，1994）。日本殖民經驗、失憶的階級形成與運動經驗、國民黨外來族群少數統治、大中國法統意識下塑型的文化和語言歧視、根深柢固的反共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做爲知識界長期主導思想與政治現實上長期威權統治之間的落差，以及孤立的國際外交處境等因素去理解。當然，世界上其他地區同一時期發生的「第三波民主化」、蘇聯解體與冷戰形勢的鬆動與崩解，也與前述許多因素共同促成了台灣的本土化與民主化。本土化與民主化訴求，在這些複雜條件下興起，也適時成爲衝撞戰後台灣「舊體制」(*ancien régime*) 的政治反對運動所憑藉的資源。

民主化與本土化固然是正當訴求，但也使既得利益政治團體被邊緣化，刺激「外省」族群產生被排斥、被威脅的相對剝奪心理，使得台灣

的民主化的進程，浮現社會分化、族群對立的隱憂。民主化與本土化動向的最大獲益者（李登輝、國民黨本土派及民進黨），在此脈絡下也必須嘗試整合分裂的國族認同，是以李登輝創造了「中華民國在台灣」、「主權在民」和「生命共同體」論述，民進黨則以「命運共同體」以及「住民自決」論述，都在企圖拓寬「台灣人」可能指涉「本省」或甚至福佬族群的狹隘意義，並且透過接合（而非收編、消滅）原本的族群差異，營造新的霸權（共識）論述，最終目標在建立新的認同——例如「新台灣人」——在公共論述上的正當性與主導性。

回頭來看這段紛擾的認同政治的發展，「新台灣人」與類似的「母親台灣」等認同論述的發明，與其說是事前謀劃企圖建立一個現實上不存在的「新」認同參考架構，不如說是對既存認同的事後確認（*ex post facto*）。不過，「新台灣人」的主體認同的植根（*embedded*）雖是歷史事實，要在公共論述空間裡取得正當性或普遍共識並不容易，因為在特殊的兩岸形勢與長期累積的大中國國族主義的感情投射與文化認同的中介下，它極易讓人產生企圖割裂與「中國人」文化認同的意義交疊部分（或時論所謂的「去中國化」）的聯想，因此大多數人雖然承認現實上的「新台灣人」身份，但並非都承認這類論述在理性批判的公共論述空間的正當性，從而形成各種感性不少於理性成分的、對立的國族主義想像，也使國族認同並非祇透過理性論辯，就能夠輕易獲得凝聚。明乎此，下文聚焦於國族認同的感性因素，以進一步說明感性因素在協商與鞏固國族認同的重要性；本文也將論證的是，一種共同的感知結構，如果能暫時拋開政治正確與否的考慮，事實上已經在共同的歷史經驗及傳播的中介下成形，構成跨族群界線的台灣國族認同的堅實基礎。

一、國族認同的道德經濟

認同與差異永遠存在互賴又互斥的緊張關係，一方面自我認同是因他者的存在才可能獲得界定，亦即必須承認他者有不同於己的差異性，另一方面自我與他者有所差異的「事實」又必須不時確認，以免自我失

去獨特性，導致與他者的分界模糊。在日常生活實踐的場域內，到底人們以何種方式協商其國族認同/差異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也許我們可以從「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 概念得到啓發，至少可將它當作有助於分析國族認同形構過程的參考概念。⁽¹⁾ 就延伸的意涵來說，道德經濟概念不僅可以用來解釋小至家庭內成員間無私的施與受，大至國族共同體內的公民參與；道德經濟概念也有助於解釋正式經濟中的活動，例如認為社會有責任濟助不幸成員使其基本生存需求不虞匱乏，就此而言，社區互助行為與福利國家的形成，提供了部分佐證。換句話說，道德經濟按照道德情感規範著社會關係與社會資源的分配，並且影響社會行為。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族認同必然包含道德經濟的特性，例如戰時為國犧牲的無私情愫，或是對保家衛國的召喚隨時準備回應的心理狀態 (readiness)，乃至於相信犧牲小我可以保全大我 (「我死則國生」) (Anderson, 1991)，⁽²⁾ 顯然都不是基於純粹的理性計算與利己動機而產生的行動。因此，基於前述感性因素在台灣國族認同問題上的重要性，本文認為「道德經濟」觀點或可提供新的視野，有助於釐清表面上被放置在理性政治領域的集體認同，在日常生活實踐上以道德、感性因素為其運作基礎的現象。

國族主義理論經常將國族主義區分為「族群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與「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等兩種類型 (Smith, 1991)。前者以血統、語言、共同文化、集體記憶等源初的感性因素為基礎，強調國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community of fate) 或「記憶共同體」(community of memory)；後者以憲政法制、公民權責等理性因素為基礎，強調國族是一個以自由民主、平等參與為原則而形成的公民共同體 (community of citizens)。由於族群國族主義容易為威權民粹主義或排他、掠奪性的法西斯主義所利用，因此當代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普遍認為公民國族主義是比較理想的國族主義。問題是這祇是理念型的區分，現實上許多民族國家都面臨如何調解族群國族主義與公民國族主義的兩難處境，例如強調族群文化多樣性的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是否會損及民族國家的社會整合及國族認同的凝聚？或是，傳統上族群國族主義色彩較濃厚的國家如何向公民國族主義轉化？

以國族主義理論著作普遍歸類為族群國族主義的德國為例，應如何面對「大屠殺」的歷史罪惡感？如何深化民主與疏遠族群國族主義，以便安頓外來移民漸增的國族組成現狀？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提出深切反省，提出所謂「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做為形構當前德國國族認同的理論原則，事實上也可視為是鼓吹某種類型的公民國族主義，希望建立的是不以血統、感性為基礎的族群國族，而是以民主、理性為基礎的公民國族。在此，哈伯瑪斯並非否定道德與感性因素的重要性，而是希望以民主理性的憲政愛國主義去替代以族群等源初因素，做為支撐民主國族政治運作的情感基礎，也就是將潛藏危險因子的感性因素重新導入憲政法治規範的正軌之中，使其「變得安全」(making affect safe) (Markell, 2000)，從而使社會整合、國族認同凝聚與族群文化多樣性的目標都能一併達成。然而，Appadurai (2000) 及 Markell (2000) 批評哈伯瑪斯過於樂觀，認為憲政愛國主義不足以充分滿足國族認同凝聚的需要，因為在他們看來，國族認同在現實上可能要求更多、更深、更全面的情感連帶 (full attachment)。(3)

延續此一認識，本文肯定陳光興在〈為何大和解不 / 可能〉一文中對政治認同情感因素的正視，但也將對他所捕捉的「外省」、「本省」族群的兩種情緒結構 (emotional structure of feeling)，提出商榷意見。定位為一種「內在批評」(internal critique)，本文的寫作目的不在否定陳光興的問題意識及其分析洞見；相反地，本文係立基在該文的論證基礎上，討論現實上存在著(另)一種共通的感知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 的可能性，希望能對牽動、甚至不斷干擾台灣民主化進程的認同/差異問題，再作辯證與補充。

二、「大和解」的感知結構

一或多？太快對這個問題作出結論，並非好事。(Plato, *Philebus*)

這種關於認同可以被敘述成存在著（支撐其各自之形成的）兩種歷史，一個在這頭，一個在那頭，雙方從未交談，也從未與對方接頭的想法，若把此一心理分析結果轉而落實在歷史形勢之中，根本就不能站得住腳。不再能站得住腳，就是如此簡單！（Hall, 1991: 48）

陳光興（2001）在對電影〈香蕉天堂〉與〈多桑〉的詮釋中，解讀出兩種差異極大的情緒結構，反映著冷戰效應與殖民主義分別在「外省人」與「本省人」族群烙印下差異化的歷史經驗、記憶和心理投射。對他來說，此一情緒結構上存在的差異與分歧，導致「外省人因其在大陸期間的抗日經驗而無法體認本省人的日本殖民情結及苦難，本省人則不能理解因冷戰而強制遷移的戰敗政權下子民的戰爭傷痛經驗」（陳光興，2001: 87）；雙方因不能同情地理解而排斥對方的歷史經驗與情感之外，「甚至以自己苦難的經驗來置換看到對方悲情的可能性」（陳光興，2001: 87）。

在陳光興看來，這樣的差異化或甚至對立的兩種集體情緒結構，不但曾經存在，而且延續至今，造成台灣選民在選舉時「用選票站邊」，也可解釋台灣政治動員過程常見各種情結（包括「省籍情結」、「李登輝情結」、「新黨情結」、「民進黨情結」、「親民黨情結」）。另外，他也在文中強調：「大膽的說，台灣『社會』所製造出來的主要對立與矛盾不是統獨問題，而是省籍問題，省籍問題較統獨問題來的更為隱形，更為深層，也更不可說」（陳光興，2001: 88）。對他而言，這兩種不同的情緒結構，「造就了衝突矛盾的情緒基礎」（陳光興，2001: 55），或可用來「解釋為什麼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以及所謂的『本省人』與『外

省人』之間省籍矛盾的『大和解』，乃至於更為複雜的統獨爭議的化解，甚至是兩岸之間的和平，是不可能的」（陳光興，2001: 55），似乎有總結台灣戰後歷史經驗、解釋當代政治現況與預測未來兩岸關係動向的企圖。

不同於（但不必然對立於）陳光興的分析結果，本文的論證依據取自內容分析 267 齣電視連續劇劇情大綱、文本分析兩部本地生產的國族歷史電影，以及兩度深度訪談 19 個家庭的電視觀看和影視文本詮釋經驗，指認出的不是可以清楚分割的兩種情緒結構，而是（另）一種曖昧共通的感知結構（或可暫且稱作「新台灣人認同的感知結構」）。後者的形成基礎包括共同的媒體經驗，其內容特徵則是「混雜性」（hybridity），對於台灣政治共同體想像（做為長期積累的歷史社會變遷過程），具有局勢中介及構成（constituting）的作用。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必須指出，族群 / 省籍概念本身是一種人類學的建構（Banks, 1996），其在本地的歷史性建構尤其是反映了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的運作；象徵權力是一種「構成」（constitution）的權力，亦即一種創造新 / 舊團體的權力（Bourdieu, 1990: 135-137）。觀諸戰後台灣的族群 / 省籍區分，大致上正是官方主導的象徵權力運作產物，從戶政制度到國語教育，都一再因為大中國法統意識作祟，而「意外地」鞏固了戰後初期因為語言差異及二二八事件而造成的「外省一本省」之分的軸線。⁽⁴⁾ 這兩個「族群」的內部同質性，並不多於它們之間的異質性，而是透過「共同體的象徵建構」（Cohen, 1985）所創造出來的「象徵族群性」（symbolic ethnicity），類似「歐裔白種美國人」在美國被賦予的「族群」意義（Alba, 1990）；在台灣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性」，也應作如是觀。我無意否認（「內部」差異極大的）「外省人」具有「族群」意義，因為經歷戰後初期與「本省人」之間的衝突，政治權力與文化權力結構曾經存在比例嚴重失衡的族群景觀（黨政軍及媒體權力，在 1990 年代前確實為「外省人」所主控，見王振寰，1993；田弘茂，1989）等歷史結構因素影響下，「外省人」可能非自願

地被整編（或召喚）進入制度性的結構位置當中（與這個結構位置相呼應的因素可能還包括眷村與「本省」社區之間隔而不離的空間經驗、職業上主要分佈於軍公教與國營企業而同時兼有的黨國利益集團成員及工資勞動者的雙重身份等），共同鞏固了「外省人」的集體認同，並且強化這個集體認同與想像的「異己」（「本省人」）的差異。反之亦然。

簡單地說，這兩個「族群」在台灣的形成過程，象徵權力的運作要多於物質基礎；的確，這兩個「族群」畛域之分曾經存在而且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滲透性，但在歷經半世紀共同生活且彼此通婚、同學、共事的情況下，「外省人」、「本省人」做為社會類別與其「象徵族群性」的有效性，令人懷疑。如果外省本省之分，不能再單純地從字面上去理解（因為它們是浮動而非固定的意符（floating, not fixed signifiers）），而且其做為社會類別的有效性不若當年（例如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那麼政治人物動輒宣稱這「兩個」「族群」由於源初的或歷史的經驗，而擁有延綿至今、通向未來的差異、矛盾、對立的情緒結構，實有「鞭打死馬」（flogging a dead horse）的嫌疑；要避免在理論上以鞭打死馬的方式處理省籍／族群問題，比較好的理論立場應該是相信它們不再具有如往昔會有的解釋力。如 Hall（1991: 46）所言，「關於如何開始思考認同問題的問題（個體或社會的），不是因為它消失了，而是因為它已受蝕、萎縮，因為它不像過去那麼具有支配力，也不再像過去那麼具有解釋力。」

誠然，「省籍」仍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類別，至少其象徵族群性在當前台灣社會仍可見其殘存的軌跡；然而，陳光興關於「外省一本省情緒結構」的論述，似乎有冒著將這個方便、但應存疑的族群分類方式「實／物化」（reification）的風險。我的研究發現與此有些出入，從文本與閱聽人分析之中引出（另）一種曖昧共通的感知結構；此一共通（若非共同）的感知結構，不僅穿透於媒介再現與閱聽人接收之間，也模糊了所謂「外省一本省」的分界線，或許可說是構成了當前台灣的國族認同的感性基礎。⁽⁵⁾ 正如本節開頭的引言所示，本文目的不在於對台灣的

情緒（感知）結構是「一或多」的問題提出任何結論，而是站在陳光興關於兩種情緒結構的論證的基礎上，捕捉另一種台灣的感知結構的可能性。

參、方法的迂迴進路

在呈現本研究的論據之前，或可先從 Katz 與 Curran 關於傳播與國族認同關係的觀點入手，從中找尋超越傳統理論立場去思索傳播與國族認同關係的可能性。

Katz (1996) 討論以色列個案時，對多頻道電視及境外電視的興起深以為憂；他相信全國廣電媒介是過去以色列得以凝聚其國族認同的動力，但當前媒介生態變化卻可能造成以色列國族認同分崩離析的危機。相反地，Curran (1998) 以英國個案相駁，認為多頻道電視尚未形成主流媒介，因此傳統的廣電媒介仍然穩當地鞏固著英國人的國族認同。乍看之下，兩位學者的判斷差異很大，但實際上卻共享著一種過度簡化的媒介效果觀：國族廣電媒介凝聚國族認同，多頻道及境外廣電媒介的消費則不利於國族認同。

本文以為，Katz 與 Curran 的上述說法無法掌握傳播媒介與國族認同關係的複雜性。為了掌握傳播媒介與國族認同關係的複雜性，有必要以多重來源的資料及分析方法為根據，透過類似「三角測量」(triangulation) 的過程（見 Lindlof, 1995: 239），亦即藉由歸納、綜攝的方式，尋求一個最可信的答案區間，而非執著於發現單一、非此即彼的定論。在呈現經驗資料的詮釋分析結果之前，我也將分別解釋本研究所蒐集的不同性質的經驗資料，在研究方法上的考量及其取樣過程。由於篇幅限制，下文對分析證據的呈現方式毋寧是簡略的，但盼此一缺陷無損於達成本文捕捉並勾勒國族認同感知結構的企圖。⁽⁶⁾

一、家庭電視經驗與接收情況的深度訪談

在本研究中納入電視家庭觀眾的分析，係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看電視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一種在家庭內進行的集體（儀式）活動；他們不祇是一起觀看電視，更一起談論電視節目（Silverstone, 1994）。截至目前為止，電視所佔去的家庭共同活動的時間，也尚無任何其他媒介可以取代，而且影響了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規律（Scannell, 1988: 25-26）。再者，家庭或許是個人獲得並協商其族群／國族認同的一個關鍵場所（Sibley, 1995: 108; Wallerstein & Smith, 1992: 19），因此家庭與國族之間經常有隱喻上的連結、類比關係，正如 Morley（2000: 107）所指出的，「家庭的國族化與國族的家庭化」在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中存在著結構性的對應關係，不能以巧合或意外視之；再者，家庭也可被視為是「全球化與在地化力量交會」的場所（Morley, 1992: ch.13）。綜合而論，瞭解人們在家庭情境裡如何經驗且詮釋電視所再現的世界，對於我們掌握人們如何理解國族認同，自有其重要意義。

因此，后文中一部份的論證依據，來自於前後間隔約一年半、兩度對 19 個省籍背景歧異的核心家庭（總共有 62 位分屬兩個不同世代的家庭成員受訪，其中於 1998 與 1999 年期間兩度受訪的有 50 位）進行的深度訪談，並且與受訪者一同觀看后文將討論的兩部國族歷史電影（即〈梅花〉與〈悲情城市〉）的部分片段（相當於影片六分之一左右的內容），結果指向的是一個無法以省籍切割的「族群地景」（ethnoscape）（Appadurai, 1990）與影視文本詮釋方式。

本文在取樣過程中發現，很難將受訪家庭固著於特定的省籍／族群背景，即使選樣時務求「純粹」而不可得，展現的是多現交錯的族群地景，本／外省（外）祖父、外／本省（外）祖母錯綜複雜的家庭系譜相當普遍，而且絕大部分的家庭受訪者（包括許多為研究方便而認定為「外省」家庭的受訪父母）對於自我的省籍身份的認定，至多是曖昧而不確定的，而這也反映在企圖按照省籍背景做為取樣標準的困難，最後在妥

協的情況下，祇好在最初接觸且同意受訪的 60 位左右的青少年中，以他（她）們所報告的父系祖父的出生地與族群背景，做為認定這些家庭的「省籍背景」的權宜判準，並從中選取 19 個核心家庭（分別是 6 個「外省」、6 個「客家」及 7 個「福佬」背景的家庭，樣本家庭依序編號為 F1-F19），對這些家庭的 62 位成員進行深度訪談。這些受訪家庭的成員，年齡分佈集中在兩個世代，受訪父母多在四十至六十歲之間，而受訪子女則在十八歲至二十五歲之間；男略多於女；全部受訪家庭都居住在台北縣三重地區（見表一）。從這些受訪者身上，我發現他們自覺的省籍身份的曖昧性與多重性，正好顛覆了研究者用省籍身份將他們對號入座的有效性。

表一：受訪家庭的人口學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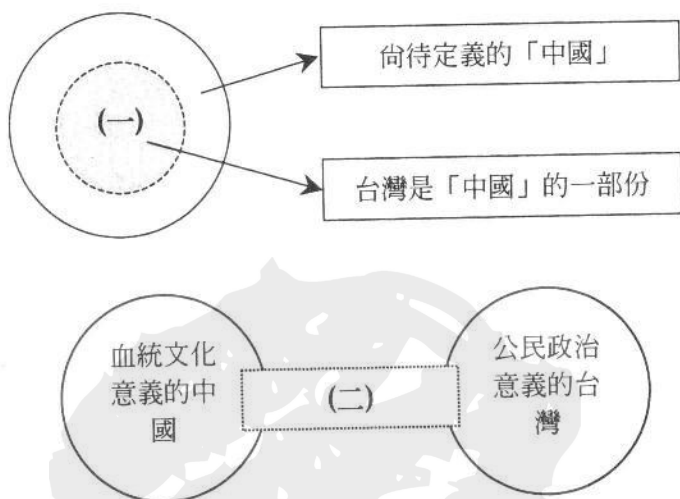
		「外省」家庭	客家家庭	福佬家庭
性別	男性(共 32 位)	10	9	13
	女性(共 30 位)	9	9	12
世代	父母 (共 38 位)	12	12	14
	子女 (共 24 位)	7	6	11
省籍 / 族群	「外省」(14 位)	12	2	0
	客家 (共 13 位)	1	10	2
	福佬 (共 24 位)	2	2	20
	混雜 (共 11 位)	4	4	3

首先，無論就其對 1970 年代電視進入家庭空間在個人生命史上所佔據的凸出位置，以及受訪家庭對於若干媒介事件（如蔣介石的喪禮儀式、觀看世棒賽轉播及親子圍繞電視產生的互動經驗等）的共同記憶（包括舉國上下的悲痛或歡慶），甚至他們對於過去若干電視連續劇（如〈保鏢〉、〈寒流〉、〈星星知我心〉等）的情感涉入程度，這些受訪家庭觀眾的電視經驗可說都非常近似，而且幾無省籍差異。此外，他們對於七〇

年代的政策宣傳電影與八〇年代的台灣新電影的觀影經驗及詮釋方式，也頗為雷同，而其中存在的某些差異，也無法完全用省籍軸線來切割。換句話說，在控制世代與性別等變項後，省籍背景差異對他們如何詮釋影視文本並無顯著的解釋力。

其次，他們對於電視節目及電影的文本詮釋方式，以及他們對於國族認同的感知結構大多表現出同時是混雜的，以及以台灣為國族想像投射對象的形式（如圖一），而且與大多數民調及學術調查結果相仿的是對於「現狀」的認同：⁽⁷⁾ 統獨對大多數受訪家庭而言，祇是構成其清楚的台灣現狀主體認同的除外選擇，或借用 Hall 的話來說，統獨選擇對於他們所持的台灣主體認同來說，祇是兩種「構成的界外」（the constitutive outside）（Hall, 1996: 4），雖然不時作用於（或騷擾）他們對台灣現狀的主體認同，但對他們來說兩者祇是提供了「非選項」（no option），反而使他們對於現狀的台灣主體認同更加清楚：台灣做為「中國」的一部份（as a part of “China”），與台灣同時事實獨立於中國之外（as apart from China），在受訪者的國族認同內容裡，兩者並無必然不能並存的矛盾。

根據 Raymond Williams 的觀點（見 Williams & Orrom, 1954: 15; Williams, 1977: 132-133, 1987: 10），感知結構在特定時空情境下同時「結構」了媒介文本，而且可以被閱聽人「感知」到，從而反映了特定時空的集體心態，也開啓了我們得以理解特定時期文化的可能性。簡單地說，感知結構的概念不但有助於指認閱聽人電視經驗及對文本的接收詮釋情況，也可能同時作用並形構了媒介內容的再現方式。因此，本文接下來將試圖描繪可能同時存在於媒介再現內容（包括電視連續劇與國族歷史電影）與閱聽人接收經驗中的感知結構。



類型（一）：可以描述 11 位在樣本（62 位）中的受訪者的國族認同感知結構：包括 F1（父、母）、F2（父）、F3（父）、F4（父）、F6（父、母）、F7（母）、F9（父、母）及 F12（父）。

類型（二）：可以描述樣本中大多數的受訪者（44 位），例如 F2（母、兒子、女兒）、F4（兒子）、F5（父、母、女兒）、F7（女兒）、F8（兒子）、F9（兒子）、F10（母）、F11（父、母、女兒）、F12（兒子）、F13（父、母）、F15（母）、F16（父、母及兩個兒子）、F17（父、母）、F18（父、母）及 F19（父、母）。

兩類型的例外：認為自己「祇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而且在詮釋影視文本時也顯現此一特質者，在樣本中有七位受訪者，包括 F10（女兒）、F13（女兒、兒子）及 F17（兒子）等。

說明：F1-F6 代表樣本中的 6 個「外省」家庭、F7-F12 代表樣本中的 6 個「客家」家庭，而 F13-F19 代表的是樣本中 7 個「福佬」家庭。

圖一：台灣主體認同及其感知結構

二、電視劇劇情大綱的內容分析

電視連續劇向來對台灣電視廣告收入很重要，而且仍然是收視率最高的節目類型之一。在相關文獻裡，電視與電影被認為「對於集體記憶與認同的建構，扮演關鍵角色」（Morley & Robins, 1995: 91），而且在此一面向上，各類型的電視劇尤其顯得重要（見 Ma, 1995; Martin-Barbero, 1993, 1995）。做為 1970 年代以來台灣電視最主要且多屬本地製作的一種電視節目類型，如同電視及廣播在其他國家的表現（見 Moores, 1988），電視劇可能扮演著形塑集體記憶、標誌個人生命史與凝聚國族認同的角色。自 1970 年代初期以來，電視連續劇開始佔據三家無線電視台的黃金時段，至今仍無改變，構成了 Williams (1983: 12) 稱作「戲劇化社會」（a dramatized society）的特殊文化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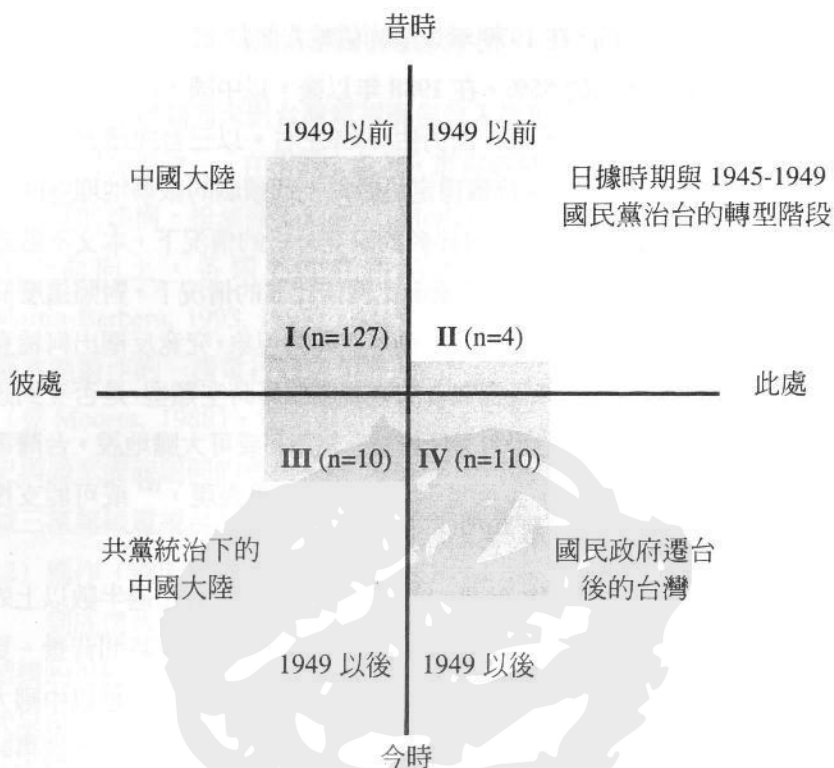
到底這些吸引人們日復一日觀看的電視戲劇節目，對國族認同感知結構的可能影響為何？也許值得先行分析的是：這些戲劇節目以何種方式呈現？本文根據 1971 年至 1996 年的完整電視節目表，隨機抽樣出 267 齣電視連續劇，包括〈大路〉（1972，中視）、〈西螺七劍〉（1972，華視）、〈星星知我心〉（1983，台視）等，並參酌《電視週刊》、《電視年鑑》、報刊影劇新聞等資料，重建這些連續劇的劇情大綱，接著分析構成其戲劇故事場景的敘事時間及敘事空間。簡單地說，此部分的分析企圖指認台灣電視連續劇在時空再現上的歷史結構與趨勢。

以 1971 年與 1996 年做為選樣起迄時點，是因為這兩個年份在台灣電視史與政治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1971 年是台灣無線電視台三足鼎立局面的開始，也是電視連續劇大量佔據電視播出時間與彩色電視時代的分水嶺，而且在同一期間電視的普及率大幅攀升，同年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會員國身份。1996 年是無線電視三足鼎立的最後一年（民視與公視分別在 1997 及 1998 年建台開播），也是台灣舉行首屆總統直選的一年。

分析結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電視連續劇持續以中國大陸為

敘事的主要地理空間，在 1979 年以前約佔電視劇的 52%，1980 至 1987 年間佔該時期連續劇的 55%。在 1988 年以後，以中國大陸為敘事地理空間的連續劇比例稍微下滑，但仍佔 45% 左右。以三台連續劇多為本地自製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持續穩定佔據電視連續劇的敘事地理空間的現象，值得玩味再三。在缺乏可比較的研究分析的情況下，本文不敢遽下斷語，究竟在台灣本地自製連續劇比例如此高的情況下，對照這麼高比例的以產地外的地理空間為戲劇敘事空間的現象，究竟反襯出何種意義？本文也不打算在此深入探究台灣電視劇銀幕時空類型，是否受到政治因素或收視率競爭的市場考量所影響。然而，或可大膽地說，台灣電視劇所展現的時空類型，是相當罕見的一種電視表現，⁽⁸⁾ 或可能支撐一種流通於受訪觀眾間的特殊感知結構。

其次，就電視連續劇中敘事的歷史時間來說，也有超過半數以上的連續劇是以 1949 年以前的歷史時間，做為連續劇的敘事時間背景。更重要的是，屬於這種敘事時間類型的電視劇絕大多數同時也是以中國大陸為敘事的地理空間。卡方分析結果顯示，台灣的電視連續劇在敘事時間與敘事空間的呈現上，確有顯著差異（ P 值小於 .001）（見圖二），而這種特殊的電視敘事時間與空間的呈現方式，提供了台灣民眾形成其混雜的國族認同（hybrid nationhood）的象徵資源。



說明：圖中數據不含樣本中在時空場景上不屬於中國大陸或台灣（或無法判斷）的 16 齣電視連續劇。

圖二：台灣電視連續劇的時空敘事類型分佈概況

從上述簡要分析結果可知，台灣電視劇所構成的通俗劇世界（melodramatic world），確實談不上「台灣化」，即使在 1988 年政治民主化與台灣化進程開展之後，亦無明顯轉折或翻轉的情況發生。其中最明顯的特徵是台灣的無線電視，一如台灣的其他教育文化機制，象徵性地在台灣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在此文化地理的空間圖譜裡，中國大陸構成了一種「不在場的存在」（absent presence），而台灣本身反而變成了「在場的不存在」（present absence）（另見 Johnson, 1994），特別是在台灣的通俗劇世界裡，與中國大陸相

反，台灣變成了缺乏本地歷史深度的地方。因此，過去數十年間，「中原」做為懷舊投射卻無法親臨斯土的想像空間，與台灣做為現實但失憶的居所，相互拼湊出一種雙元、共構的時間和空間意識，從而累積、沈澱並協商出一種介於中國大陸「想像祖國」(an imaginary homeland) 與台灣「現居家園」(the inhabited home) 的混雜認同。

三、國族歷史電影的脈絡與文本分析

分析國族歷史電影的理由，在於考量其對於再現國族歷史的重要性 (Landy, 1996)，因為國族電影可被是為整體社會創造自身歷史與解釋自我的重要機制，提供了豐富的「國族敘事」(narrative of nation) (Hall, 1992: 293)。因此，將一般人無法親身經驗的國族歷史搬上銀幕，涉及了誰有權力重新書寫歷史，因為歷史的銀幕再現，可能(在技術上)比歷史本身還要更加「真實」(McQuire, 1998: 145)。此一部分的分析，企圖探討國族認同在台灣歷史的不同時點上如何被論述建構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以補充前項有關電視劇時空再現趨勢的量化分析資料。分析對象包括兩部在不同年代生產的國族歷史電影 (national historical films)，一是 1976 年上映的〈梅花〉，一是 1989 年上映的〈悲情城市〉，這兩部表面上對台灣歷史詮釋有極大差異的電影，在上映當年都是票房表現最佳的國產電影，究竟它們再現歷史的敘事有何異同，以及它們各自在特定的產製情境 (production context) 下扮演的角色，值得進行歷史脈絡與文本結構的分析 (con/textual analysis)。

首先，〈梅花〉與〈悲情城市〉的出現，反映了個別的歷史脈絡：前者是出現在外交孤立、蔣介石逝世的人心飄搖的 1970 年代，後者則是政治解嚴、兩岸恢復接觸與六四屠殺事件發生的 1980 年代晚期。1970 年代政策宣傳電影開始大量集中在抗日題材，其中最特別的是以台灣為敘事地理空間的〈梅花〉，而〈悲情城市〉在 1989 年公開上映，則引爆了本地政治解嚴後仍然懸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這兩部電影出現的歷史脈絡，以及片中處理的 1949 年以前的台灣歷史時期，台灣國族認同都

面臨著重新定義的局勢，而且外在歷史條件的轉折也構成了進行此種重新定義的脈絡。

其次，這兩部電影的國族敘事方式有很大差異（見表二），〈梅花〉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中華國族主義的代表作，而做為「台灣新電影」成熟作品的〈悲情城市〉則相對上反映了某種台灣國族主義的感知結構，重新再現台灣的歷史經驗，並且「為台灣的人民記憶創造了新的銀幕空間」（Yip, 1997: 140）。如果說〈梅花〉極力描繪的是二戰期間台灣人與祖國同心，擁抱中華國族主義的感知結構，〈悲情城市〉則凸顯了戰後初期台灣人對祖國的疏離，以及對中華國族主義的抗拒。

〈梅花〉與〈悲情城市〉各自代表不同的國族歷史敘事類型，呈現了不同台灣歷史觀，前者採取的是強調傳統、同源、同質與連續的歷史敘事類型，後者採取的則是強調批判、異質與斷裂的歷史敘事類型（見表三）。具體地說，〈梅花〉呈現的是中華民族戰勝異己日本人的光榮歷史，而且將台灣「光復」的歷史過程自然化。片中強調共同祖先、忠孝倫理及自我犧牲等修辭，並且將之轉譯為國族主義的認同情感，是以片中「台灣人」無分老幼、階級和性別，每個人都獻身於國族的神聖抗敵任務當中，連小學生都與「小日本鬼子」在街頭混戰。片中的南台灣小村落被描繪為當時台灣社會的縮影，其命運與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明示只有中國抗戰勝利，台灣人方能自痛苦的殖民地統治中獲得解脫。相反地，〈悲情城市〉呈現非官方的台灣史敘事，動搖甚至嘲諷單線書寫、強調同源和同質的歷史敘事。

另從片中採取的論述策略來看，〈梅花〉明顯訴諸「同化」（assimilation）的路線，目的在建構國族的同質性（national sameness），而〈悲情城市〉則偏向「去同化」（dissimilation）策略，建構的是國族內的差異（intranational differences）（de Cillia et al., 1999: 151）。簡單地說，「台灣人」與「中國人」在〈梅花〉一片中是和諧並存的兩種認同，而且前者毫無異議地從屬於後者；在〈悲情城市〉中，這兩種認同之間卻存在差異與衝突。再者，〈梅花〉一片以日本人為國族的共同敵人，〈悲

表二：〈梅花〉與〈悲情城市〉的敘事差異

	梅花		悲情城市
語言	◇國語、日語		◇國語、福佬話、上海話、廣東話、溫州話及日語
敘事歷史時間	◇約 1939-1945		◇約 1945-1949
敘事地理空間	◇台灣	◇銀幕呈現但未指明地點(某個位於南台灣的小村落)	◇銀幕呈現台北、九份、八斗子等地
	◇中國大陸	◇銀幕呈現但未指明地點(中國大陸抗日場景)	◇南京、上海(在片中提及但未在銀幕上呈現)
電影敘事中的「他者/異己」(誰是「他們」?)	◇日本人		◇「外省人」(國民政府、軍隊)
自我認同(「我們」是誰?)	◇台灣人	◇聚勇、聚光分別在兩個不同的情況下指認自己是「台灣人」	◇文雄、文清、寬美與寬榮等人
	◇中國人	◇片中大多數人物(例如林家老父、文英、聚光、片中的許多中小學生及其他配角)	◇無
被「他者」承認的自我認同(在「他們」眼裡，誰是「我們」?)	◇混雜認同(時而「台灣人」，時而「中國人」)		◇「台灣人」或「台灣同胞」(片中上海黑幫或代表國民政府的陳儀在廣播中對本地人的稱呼)

表三：〈梅花〉與〈悲情城市〉的歷史敘事類型比較

	記憶	連續性	身份 / 認同	歷史感
梅花	強調同源的歷史構成當前的生活形式	強調同源的歷史經驗歷久彌新，強調同源歷史經驗的連續性	確認自我身份/認同有其事先給定的歷史文化基礎	在此類型的歷史敘事中，時間彷彿是靜止的，因此有其不朽的恆久性
悲情城市	強調歷史的轉折變化，並將當前的生活形式問題化	質疑同源歷史經驗的連續性	挑戰身份/認同有任何事先給定的歷史文化基礎	在此類型歷史敘事中，歷史本身不具客觀性，而是有待主觀判斷的對象

來源：修改自 Rusen (1987: 91)

情城市〉裡的日本人則更近於是友非敵的關係，取而代之對片中角色造成威脅的來自海峽對岸，包括上海黑幫及國民黨軍政勢力。

儘管表面上兩片有如前述的極大差異，這兩部在不同時空環境下都非常賣座的國族歷史電影，事實上仍有其建構台灣主體認同的共通作用。〈梅花〉罕見地在抗日政宣電影中賦予「台灣人」犧牲抗日的積極角色，除了企圖將「台灣人」重新整編在中國國族主義的「大敘事」之中，也在台灣處境艱難的 1970 年代發揮了凝聚共同體與號召團結的作用；同樣地，〈悲情城市〉藉由悲情歷史的呈現，傳遞了族群相互諒解與寬容的訊息。整體而言，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兩片提供的是充滿道德與感情訴求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 與「國族教材」(national pedagogy)，分別為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末期處於特殊歷史局勢下的台灣社會，提供了象徵性共享的「此地此刻」

(the commonly shared 'now here')，也構成一種事實上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想像的基礎。

肆、局勢中介的傳播

前述分析強調的是媒介再現、文本生產，以及閱聽人接收詮釋的外在歷史局勢和家庭互動情境，而且發現的是一種曖昧共通的感知結構，或是一種混雜國族認同在「歷史文化中國」與「當代政治台灣」的多重接合（如圖一中各種類型的國族認同形構狀態）（另見江宜樺，1998）。如同前述所強調的，這個混雜的國族認同，事實上是「混而不亂」（hybrid but not de-centered），佔據的是統獨之外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借用自 Bhabha, 1990），因此支撐新台灣人的主體 / 現狀認同的，正是前述分析所發現的曖昧共通的一種感知結構，而後者不僅存在於（且中介於）媒介再現與閱聽人接收詮釋之間，也在歷史局勢的變化中不斷重新定義。

一、為何是局勢的？

爲了瞭解台灣的國族認同形構，我們有必要將它置於導致其形成的變動歷史局勢當中。台灣之所以具有國族政治共同體的意義，完全是歷史局勢多元決定的偶然形構（a contingent formation）；百年以前，或五十年以前，幾乎沒有任何歷史事實足以讓我們清楚指認出「台灣國族」的存在。因此，在其晚近且同樣充滿偶然性的歷史形構過程，它受到了一連串外在與內在歷史條件的制約。

就外在歷史條件而言，台灣意識的（再次）崛起，與 1970 年代開始的外交孤立局面脫離不了關係，像是 1971 年喪失聯合國會員國席位，1979 年中美斷交，1980 年代末期開始的兩岸交流，以及延續至今的軍事對峙與敵意。就內在歷史局勢的變化來說，在此期間台灣的經濟

發展使其逐漸成爲重要經濟體，九年義務教育實施與中產階級興起，提供了「黨外」反對運動成長的群眾基礎，而來自社會的支持力量，也是國府越來越依賴的統治正當性基礎。蔣經國推動被稱作「吹台青」（拔擢本地菁英進入政治權力核心）的本土化轉向，與當時因斷交、保釣等一連串外交挫敗而激起「革新保台」情緒，逐漸導致國民黨政權的質變。雖然在 1987 年政治解嚴與民主化轉型之前，政治上的台灣化與民主化進程，處於進一步退兩步的狀態，但在 1987 年以後，國民黨政府無法不試著彈性詮釋其長期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政治光譜上有所差異的主要政黨，儘管表面上勢如水火，但事實上極有共識地都強調「台灣優先」與「當家作主」等政治修辭，而歷次選舉也印驗，非如此，政黨不足以獲得選民支持。⁽⁹⁾

二、甚麼樣的中介？

許多學者曾對「中介」（mediation）一詞做出理論化的貢獻（如 Giddens, 1995; Martin-Barbero, 1993; Thompson, 1990; Tomlinson, 1999: 151），而是類將中介概念理論化的企圖，在媒體與文化研究領域則源自 Raymond Williams 的貢獻。Williams（1977: 88）將各種存有（being）與意識（consciousness）之間的關係，視爲一種「必然中介」（inevitably mediated）與「主動」（active）的過程，拒絕鏡子隱喻所暗示的「反映」（reflection）概念，而偏好以「中介」做爲掌握社會真實複雜性的概念工具。不過，他也提醒我們，所謂「中介」強調的是「構成」（constitutive and/or constituting）的過程，而非單純指傳播媒介做爲某種「中間機制」（intermediary）。延伸此一說法，我們應將傳播媒介視爲構成整體社會中介過程的一部份，而非僅是存在於特定的「兩造」（例如國家與民間社會，或人民與其國族認同）之間的中間機制而已。

準此，根據前述的經驗資料分析結果，我們或可超越傳播效果觀的狹隘框架，轉而接受媒體的結構性影響與閱聽人的主動施爲在國族認同形構過程並存或互補的可能性，進一步論證如何將台灣的國族認同形構

視為局勢中介的過程：

(一) 傳播媒介促成國族共同體在台灣的歷史性形成，這一個國族共同體的想像不僅基於共同文字符號 (out of signs) (Anderson, 1991)，更包括共同的溝通口語與影像消費的基礎 (out of sounds and images)。換言之，「國族」的想像不僅獲得 Anderson (1991) 所謂「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 的奧援，1970 年代以後，更史無前例在台灣發展出國民黨主導的「視聽國族主義」(audio-visual nationalism) 的文化機制。台灣做為國族想像共同體意識的對象，不僅透過閱讀印刷媒介而流通分享，從此更可以被「親耳」所聞，「親眼」所見。在台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 1970 年代，傳播媒介 (特別是全國性無線電視的興起) 適時地扮演了凝聚共同體意識的角色。

(二) 共同的傳播媒介經驗減少了族群間的差異，自 1970 年代初期以來，觀看電視已成為全國性活動，跨越了家庭的界域，也使得「本省」與「外省」的族群差異變得越來越模糊，取而代之的不得不比鄰而處的現實，或是像 Meyrowitz (1985: 143) 所說的，一種心理上被「孤立在一起」(isolated together) 的感覺 (呼應國府的所謂「保衛大台灣」、「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宣傳)，提供了面對共同命運的同舟意識。

(三) 國民黨政權對傳播媒介的意識形態操控並非天衣無縫，相反地為了迎合以本省多數人口的觀眾群，傳播媒介不斷地在中國國族主義敘事裡頭提供積極角色予「台灣人」，其結果是形成對事實上的國族共同體 (中華民國 / 台灣) 強烈的政治認同，卻不等於原先企圖營造的對中國的政治認同。此種認同方式與國民黨長期宣揚的反共教育，恰好反而共同落實了台灣的主體認同，而這正是無處不在、甚至是浸淫日久而習焉不察的「國族主義陳腐化」現象 (banal nationalism) (詳見 Billig, 1995)，在現實上落實時最可能的方式 (亦即中華民國在民眾現實認知上逐漸從「大於」變成「趨同於 / 等於」台澎金馬)，而這可能也是受訪者對於以台灣為主體的現狀認同未因性別、族群與世代而有明顯差異的原因。

(四) 如前文所述，台灣影視媒介在內容呈現上的時空偏倚，造就的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地理，支撐了一種混雜的國族認同，其中「有中國歷史的當代台灣」是過去數十年來的基調，構成了跨越省籍背景的特殊感知結構，形成「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混雜認同(江宜樺, 1998)。

(五) 家庭內的收視經驗與世代間圍繞媒介文本詮釋的互動經驗，提供了私有空間與公共空間交集對話的場域，在此過程中，閱聽人詮釋影視文本的接收方式，不必然完全被省籍、性別與世代差異形成的分界所框限，從而凝聚了異質、混雜但以台灣為主體的共同體想像經驗。

伍、結論

本文提供若干經驗分析結果，論證國族認同形構是一個局勢中介的過程，而傳播媒介則是此局勢中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換句話說，本文主張傳播媒介之於國族認同的形成，有其長期、累積的「效果」，但並非等於接受傳統效果觀點指導的簡單化論點：國內媒介培養並強化國族認同，境外媒介威脅並弱化國族認同。事實上，台灣的全國性媒介在國民黨主控之下，並未「如願」促成以全中國為對象的政治共同體想像；相反地，台灣主體認同的凝聚，在某種意義上反而變成了媒介控制與黨國支配意識形態的「非意圖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而台灣戰後大量消費的外國影視產品，與 1990 年代後高度普及的線纜電視大量引進的境外電視節目，也並未阻礙台灣主體認同的形成。

對照於陳光興所指認的兩種清楚分割的情緒結構，對於台灣民眾族群 / 國族認同的深層心理狀態，本文或有相互辯證或補充的意義。透過多重資料與方法的分析，本文論證存在著另一種穿透於省籍、族群界線，並且中介於媒介文本與閱聽人接收過程之間的感知結構，並且解釋「混而不亂」的台灣主體認同與此一共同感知結構的交疊並作(intersecting)，如何在台灣戰後的歷史局勢變化與共同媒介經驗中逐

漸形成。

本文認為，此一以共同感知結構為基礎的台灣主體認同，有其歷經數十年族群共處、命運與共的集體記憶與生活經驗，是台灣邁向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共識」來源，因此就歷史事實的發展而言，「大和解」不僅祇是一個牽涉「應然」與否的問題，更有其「實然」的面向。換句話說，實然面的大和解，或可視為是「實踐的和解」(practical reconciliation)：亦即事實的「大和解」已體現在過去數十年民眾日常生活實踐之中，是認同 / 差異的微型承認政治 (the micropolitics of recognition) (類似個案的討論，見 Sarat, 2000) 的一部份，也是構成「台灣性」(Taiwanese-ness) 或台灣文化 (整體生活方式) 的核心內容 (另見江宜樺, 1998: 201)。⁽¹⁰⁾ 台灣的主體認同乃是建立在此種開放而不斷展現「延異」(différance) 的過程，其中統獨抉擇在短期內充其量祇是「非選項」，構成了台灣主體認同當前形式的「界外」，在不得冒進跨界的客觀條件限制下，反而更清楚地定義了性質上原本應該是變動不居與意義曖昧的「現狀」，以及台灣主體認同 (不管以何種名義) 的邊界。以此角度審視，台灣的國族認同問題其實不成「問題」，也不存在真實的認同危機或認同混亂。因此，政治人物在政治競爭的現實操作上，實 / 物化族群差異，過度渲染存在所謂的「認同危機」或「認同混亂」，並企圖以人口中的多數族群將台灣主體認同純粹化或將「愛台灣」的方式標準化，不僅漠視國族認同必然「混雜」的事實，無視變動歷史局勢中介過程中已然形成的台灣主體認同，而且冒著可能將「省籍 / 族群對立」這匹死馬鞭醒的危險。

註釋

- (1) 「道德經濟」一詞，語出英國文化研究與社會史學者 E.P. Thompson，最早係用來解釋人民抗議活動，目的在於扭轉「極端的經濟化約論」對於十八世紀英國糧食暴動的詮釋。Thompson 認為，十八世紀英國糧食暴動不能簡單地以盲動的或直接受生存需求驅使的「肚子造反」視之，因為人民事實上深信他們的行動係在挺身捍衛傳統權利或習俗，而他們所懷抱的信念是窮人的需求應置於市場交易制度裡的商業利益之上；與此信念直接關連的價值觀與行動，變成一種社群共識，從而構成了窮人的道德經濟（Thompson, 1971）。受到 Thompson 的影響，人類學家與社會史研究者採用「道德經濟」概念，解釋非市場（或前現代經濟）社會交換機制的運作方式（Booth, 1994）。此外，英國傳播學者 Roger Silverstone 等人亦曾援用道德經濟的概念，來分析家庭情境中的資訊傳播科技使用與觀看電視的活動，論稱具有商品本質的電視（機），透過挪用（appropriation）、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納編（incorporation）與轉換（conversion）的過程，終究得以融入家庭空間與家庭時間之中，成為當代日常生活的一部份（Silverstone et al., 1992）。
- (2) 由中華歐亞基金會所做的調查顯示，如果兩岸發生戰爭，有七成五的台灣民眾願意為台灣而戰；不過，該基金會在 1998 年進行的類似調查則顯示，當時回答願意的比例高達八成八（中國時報 2002.07.14）。這兩項調查結果若可信，或許可以證明台灣人民事實上非常「愛國」，亦即國族認同在台灣的情感基礎十分牢固，不成「問題」。
- (3) 傳統左派學者傾向國際主義，批判或反對一切形式的國族主義，但國族主義不但沒有如他們所希望的在歷史中逐漸式微（如 Hobsbawm, 1990），反而變成相當普遍的全球現象。基進左派學者如 Laclau（1994）對後冷戰時代來臨而形成的各種特殊主義的政治

/ 社會認同，採取他們稱作「基進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 與非本質論的立場，認為國族主義壓迫個體及邊緣團體（如女性、同性戀、少數族群），也使較具進步意義的階級政治無法形成，是以主張邊緣自主團體之間應進行聯盟，透過各種異議聲音落實基進民主實踐，但並未根本否定政治共同體如民族國家與社會整合的必要性；本地一些傾向人民民主或基進民主路線的學者，更進一步主張「破」國族主義（詳見陳光興，1994；趙剛，1998）。然而，近來已有不少持左派和自由主義立場論事的知名學者，包括 Todd Gitlin、Richard Rorty、Benjamin Barber 與 Martha Nussbaum 等人，開始正視族群及國族主義問題，而且和哈伯瑪斯一樣，企圖將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撥亂反正，避免其潛在危險因子，尋找發展「進步國族主義」(progressive nationalism) 的可能性，從而對建立公平正義與族群共存的社會有所助益。雖然這些學者被嘲諷為「愛國左派」(the patriotic Left) (Fonte, 1998)，但他們在民族國家架構的既有限制下追求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和諧並存的用心，比起一廂情願認定階級問題具有優先性或是認定國族認同有害於階級認同，可能更值得肯定。與此一知識立場發展可相類比的是，台灣左派知識份子近來也對國族主義問題逐漸採取較為持平的立場，見諸在陳光興本人處理國族主義問題時誠懇的自省與立場轉折——從策略性的批判國族主義，轉而更願意掌握國族主義的複雜性（及正視其進步潛能），例如他在文中剖陳：「日本及其他地區戰後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閃躲與強勢批判國族主義只會將民眾**樸素的民族主義**情緒能量，拱手讓給長期訴諸感情層次的右翼份子及國家機器；如何在以往被認定為所謂非理性的情緒性感情結構層次操作，分析、掌握、接合、轉化社會底層的歷史情緒成為改造的力量，是極為困難的挑戰」（陳光興，2001: 94-95，粗體字為原文所加）。

- (4) 此處說國民黨政權「意外」鞏固了「外省」、「本省」之分的族群類別，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並未有意讓這種分類方式隨處「可見」

(visible)，也因為以它做為外來、少數與流亡政權的身份，不需經過精密計算，也會自覺到刻意強化這種族群分類的不智。

- (5) 早在解嚴之前的 1980 年代中期，Lucian W. Pye 自承很難找到像台灣這麼特殊的個案，政治上權力分配在族群 / 省籍上如此鮮明不均，遠遠超過在個體及社會生活的層面上族群之間的矛盾分化 (Pye & Pye, 1985: 383n32)。當然，也許我們可以說，以一個外國觀察者的身份，他可能對於陳光興所謂「隱形」、「深層」、「不可說」的省籍問題，缺乏足夠敏銳的感受。然而，就比較的意義上來說，Pye 的講法沒有太大問題，台灣因為省籍問題導致的族群矛盾或衝突，若與其他許多民主或非民主國家相比，並不算太「嚴重」。當然，本文無意據此主張用自滿的心態去看待或逃避族群問題，但也不認為放大族群問題是正確的態度。
- (6) 更詳細的資料詮釋分析以及對「感知結構」一詞的概念討論，另見 Lo (2001, 2002)。
- (7) 有關台灣民眾對於現狀所表現出來的強烈認同，可見於許多有價值的學術調查發現。這些學術調查至少包括：a.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三期第一次」(計劃主持人：瞿海源 / 章英華)；b.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三期第四次研究問卷二政治文化組」(計劃主持人：瞿海源)；c.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研究 81 年度第二次定期研究」(計劃主持人：伊慶春)；d. 「台灣地區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四次調查」(計劃主持人：瞿海源 / 張苙雲)；e. 「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計畫主持人：王甫昌)；f.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計劃主持人：陳義彥 / 洪永泰)。另外，刻正籌備進行中的「台灣地區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四期第四次調查(國家認同組)」(子計畫主持人：張茂桂)，也將進一步釐清台灣民眾這種現狀認同的意涵。
- (8) 例如一個在 1954 年由 Head 所做的分析顯示，美國播出的電視戲劇節目中，有 88% 是以美國為戲劇敘事的地理空間(見 Fiske & Hartley,

1989: 28)。

- (9) 台灣人民這一種「當家作主」的強烈意願，連至今堅持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北京當局都已經開始有所體認，並且首度表示願意「充分尊重」，見諸於江澤民在最近召開的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內容。
- (10) 所謂「實踐的和解」可以理解為某種「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這種實踐的和解，其運作方式正是我在前文已言及的是依循著「道德經濟」與「微型承認政治」的邏輯，是一種非正式的、實踐性的與規範性的知識，亦即從觀看與實作的在地經驗中取得的知識，而且通常發生在特定情境，涉及雙向的互動。Thrift (1996: 101-102) 歸納出「實踐知識」的四種特徵：它是未明說的，在歷史過程中實踐而自然化；它是連續與重複的行為互動的一部份；它是「在地的」，亦即它是在雙向互動中生產並再製的，有賴於其他人在場與接觸的經驗；它是傾向於以有機的類比 (organic analogy) 或隱喻 (metaphor) 為基礎，而這些類比與隱喻通常來自於相鄰性 (proximity) (另見 Bourdieu, 1977; Giddens, 1979, 1995)。例如本地慣用的「芋頭」與「蕃薯」這兩個相鄰的隱喻/類比所代的身份/認同，雖然從未「正式」宣告和解，但彼此承認差異，以及新的「芋頭蕃薯」的混雜認同逐漸日常生活化的事實，見證了族群之間某種實踐的和解已發生在家庭與社區等場域的事實。換句話說，從國族意義上看台灣人，這裡被稱作「台灣人」的集體認同不能從「熔爐」(a melting pot) 的意義來理解，而應透過「沙拉碗」(a salad bowl) 的意義來掌握。在這一碗沙拉裡，高苳還是高苳，蕃茄也還是蕃茄，高苳和蕃茄的「差異」仍然存在，而由它們拼盤出來的這碗沙拉也的確是「混雜的」；僅強調高苳的特性，不足以代現這碗沙拉，僅強調蕃茄也不能全然代現這碗沙拉。然而，這碗沙拉的存在事實，不會因高苳與蕃茄間存在的差異而被否定。事實正好相反，或許可以這麼說，正因為高苳與蕃茄間的差異未消失，創造了存異求同

(diversity in unity) 的可能，剛好是沙拉成爲沙拉的根本原因。儘管祇是一種隱喻的關係，芋頭與蕃薯，以及它們與「台灣人」這個混雜的國族認同的關係，同樣可以透過前述萵苣與蕃茄，以及它們與沙拉碗的關係來理解。



參考書目

- 王振寰 (1993)。〈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 鄭瑞城等 (著)《解構廣電媒體: 建立廣電新秩序》, 頁 75-128。台北: 澄社。
- 田弘茂 (1989)。《大轉型: 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 時報。
- 江宜樺 (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 揚智。
- 陳光興 (1994)。〈帝國之眼: 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7: 149-222。
- 陳光興 (2001)。〈爲什麼大和解不 / 可能?〉,《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3: 41-110。
- 張茂桂等 (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 業強。
- 趙剛 (1998)。《告別妒恨: 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台北: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羅世宏 (1994)。《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大眾媒介與反對運動: 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ba, R. D. (1990). *Ethnic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 London: Verso.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p. 295-310). London: Sage.
- Appadurai, A. (2000). The grounds of the nation-state: Identity, violence and territory. In K. Goldmann, U. Hannerz & C. Westin (Eds.),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p. 129-142). London: Routledge.
- Banks, M. (1996).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 Bhabha, H. (1990). The third space.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07-221).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Billig, M.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 Booth, W. J. (1994). On the idea of the moral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653-667.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 Calhoun, C. (1999).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In F. Engelstad & R. Kalleberg (Eds.), *Social time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y and history*.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A. P. (199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 Curran, J. (1998).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A reappraisal. In T. Liebes & J. Curran (Eds.),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pp. 175-202). London: Routledge.
- de Cillia, R., Reisigl, M., & Wodak, R. (199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Discourse & Society*, 10(2), 149-173.
- Fiske, J. & Hartley, J. (1989).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 Fonte, J. (1998). The patriotic Left? *Commentary*, 106 (3), 44-45.
- Gamble, A. (2000). *Politics and fate*.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Giddens, A. (199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nd ed.). Basingstoke: Macmillan.
- Hall, S. (1991).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A.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pp. 41-68).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 T.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pp. 273-316).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 Hall & P. du Gay

-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17). London: Sage.
-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M. (1994). Making time: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the space of nationality.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2), 177-249.
- Katz, E. (1996). And deliver us from segment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46, 22-33.
- Laclau, E. (Ed.). (1994).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 Landy, M. (1996). *Cinematic uses of the p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indlof, T. R. (1995). *Qualit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o, S. H. (2001). *Med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Television, politics and audience in Taiwan*. Ph.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 Lo, S. H. (2002). Diaspora regime into nation: Mediating hybrid nationhood in Taiwan. *Javnost/The Public*, 9(1), 65-84.
- Logue, C. M., & Miller, E. F. (1996). Gap-bridging, interaction and the provi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3, 364-373.
- McQuire, S. (1998). *Visions of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 memory, time and space in the age of the camera*. London: Sage.
- Ma, E. K. W. (1995). *Television ideologi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televis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 Markell, P. (2000). Making affect safe for democracy?: On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Political Theory*, 28(1), 38-63.
- Martin-Barbero, J. (1993).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hegemony: From the media to mediations*. London: Sage.
- Martin-Barbero, J. (1995). Memory and form in the Latin American soap opera. In R. C. Allen (Ed.), *To be continued: Soap operas around the world* (pp. 276-284). London: Routledge.

-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S. (1988). 'The box on the dresser': memories of early radio and everyday lif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1), 23-40.
-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Morley, 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 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Peters, J. D. (1994). The gaps of which communication is mad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2), 117-140.
- Peters, J. D. (1996). Sharing of thoughts or recognizing otherness? Reply to Logue & Miller.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3, 373-380.
- Pye, L. W., & Pye, M. W.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Rusen, J. (1987). Historical narration: Foundation, types, reason. *History and Theory*, 26, 87-97.
- Sarat, A. (2000). The micropolitics of identity/difference: Recogn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everyday life. *Daedalus*, 129(4), 147-168.
- Scannell, P. (1988). Radio times: The temporal arrangements of broadcasting in the modern world. In P. Drummond &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pp. 15-31).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Silverstone, R., Hirsch, E., & Morley, D. (199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In R. Silverstone & E. Hirsch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pp. 15-31).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A.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Thompson, E. P.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50, 76-136.
- Thompson, John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hrift, N. (1996). *Spatial formations*. London: Sage.
- Tomlinson, J.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 Wallerstein, I. & Smith, J. (1992). Households as an institution of world-economy. In I. Wallerstein & J. Smith (Eds.), *Creating and transforming households: The constraint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1983). *Writing in society*. London: Verso.
- Williams, R. (1987). *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 (Revised ed.). London: Hogarth.
- Williams, R. & Orrom, M. (1954). *Preface to film*. London: Film Drama Limited.
- Yip, J. (1997). Constructing a nation: Taiwanese history and the films of Hou Hsiao-Hsien. In S. H.-P. Lu (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pp. 139-16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he Identity/Difference of Taiwan: Audio-Visual Media, Conjunctural Mediation, and Hybrid Nationhood

Shih-Hung Lo*

Abstract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genesis, diffu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the media on the continuity and contingency of that identity, have generated an intense debate among scholars. These questions are studied her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case of Taiwan. By us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this article probes how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discursively represented by the media in Taiwan. It also examines how the Taiwanese audience has engaged with a spectrum of mass-mediated identities, accommodating them in different ways within the changing political and media landscapes. It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a hybrid yet Taiwan-based identity, in which ethnic antagonisms have been practically reconciled. By way of the 'conjunctural mediation' process of which the audio-visual media are a constitutive part, a commonly shared 'structure of feeling' has been emerging to sustain this peculiar form of hybrid nationhood.

Keywords: audio-visual media, micropolitics of recognition, moral economy, national identity, practical reconciliation, structure of feeling

* Shih-Hung Lo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